

文化向上再向上

——紀念台灣文化協會八十五週年

文／林瑞明

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成立於靜修女學校(今靜修女中)小禮堂的台灣文化協會，列名會員總共一〇二二人，網羅了台灣全島各界的菁英，形成「以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為目的」之啟蒙運動。促成台灣文化協會應時而出的人，是頭腦明晰、果斷，具有組織性格之台北大稻埕大安醫院院長蔣渭水。會中推選霧峰世家林獻堂擔任總理，彰化大地主楊吉臣為協理，蔣氏則被推選為總幹事，負責會務的推動。蔣渭水在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時致詞時，一開頭即說：「我生為台灣人，要感謝神。」這是一句涵義深遠的話，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人，其實連二等國民都不如，但是只要把握方向努力奮鬥，未來能夠成就無限的可能。整個啟蒙運動就是由蔣渭水這樣的青壯世代以及全島有志之士，從文化方面著手改善台灣的體質，以便將來改變弱小民族的命運。為了扼要說明，茲舉文協三位代表性的人物，以他們的事功為例：

一、蔣渭水

蔣渭水是有「政治熱」的人，但他深知「文化向上」的重要性，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發刊的第一期文協會報，隨即被總督府命令禁止頒布，十二月十日，再刊行第二期改訂版，因刊載時事，觸犯出版規則，亦被查禁；第三期改以單行本發刊《文化叢書》，第四期發刊《台灣之文化》，也因抵觸新聞紙法，亦遭查禁。第五期復用《會報》名目刊行，屢遭行政處罰，至第八期停刊為止。可見在殖民地台灣雖以推動文化運動為主要目標，亦甚不易。蔣渭水著名的〈臨床講義——關於台灣這位患者〉(〈臨床講義——台灣と云う患者に就て〉)即是發表於《會報》上。

在這篇啟蒙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獻中，蔣渭水以醫人醫世主治醫師身分，將台灣擬人化，比喻為先

天素質良好，後天失調的病患，位居「世界和平第一關門的守衛」，具有「日華親善」的重責大任。但是台灣人卻得了知識營養不良症，因此需要以文化啟蒙運動提供大量的知識營養劑，開出的處方籤是正規學校教育、補習教育、幼稚園、圖書館、讀報社，都需要大量的設置，才能從根本改善。

蔣渭水位於台北市太平町三丁目二十八番地(今延平北路二段二十九號)的大安醫院成為文化協會的重要活動場地，以及台灣民族運動的大本營。並於附近的港町二丁目(現西寧北路)設立文化協會講座及讀報社，邀文協幹部輪流演講，啟發民智。

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《台灣民報》發刊時，總社置於東京，台灣支局即設於大安醫院，支局主任由蔡培火擔任。一九二五年七月五日改為週刊後，堂堂在封面標示「台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」之《台灣民報》，代表著居留日本與留在台灣本島的有志之士共同為台灣而奮鬥。

《台灣民報》創刊時即以欲啟發台灣的文化，「唱設白話文研究會」做創刊民報的紀念事業，會所設於台南市東門町一丁目一〇五番地(今東門路)。強調「提倡白話文要做社會教育的中心。目的是要使現在缺讀漢學的人，快發表他的意思，漢學深奧的人，快將他的文言文改為白話，上下相就，普及三百六十萬同胞的智識，使他們平平享受人生本來的生活」。這個紀念事業，開啟了啟蒙運動重要的篇章，《台灣民報》也成為發表白話文學的重要園地。

一九二五年八月底《台灣民報》由初期發行三千五百部，增加到一萬部，躍居為全台第三大報，人稱「文化頭的蔣渭水」亦不客氣地自稱是「民報的褓姆」。由於發行量的激增，除了擴大社會、政治運動的影響之外，萌芽中的台灣新文學運動，亦隨之茁壯，作品的質與

1924年，櫟社舉行20週年紀念瓶贈呈式。前排：林獻堂(左二)、傅錫祺(社長，左四)、林幼春(右二)。(本圖片由文建會提供)



量都相對的提升，達到了潛移默化中「文化向上」的目的。

二、賴和

推動臺灣文學運動的主將賴和，大多數的作品即是發表在《台灣民報》、《台灣新民報》。早在一九二一～一九二四年，他即在傳統詩的稿本上，練習寫白話詩文，奠定了寫作的基礎。有了《台灣民報》，得以盡情的演出，他以中國白話文為基調，加上一些台灣俚語、俗語、諺語加重不可或缺的台灣色彩，形成文學的特殊風格。賴和以作品帶動台灣新文學的風潮，加上後來擔任《台灣民報》「學藝欄」的主編，更進一步介入新文學運動，對於文學發展的方向，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。賴和編輯的工作，十分吃重，他的朋友楊守愚曾回憶：

通常，一個編輯的任務，無非只是擔任作品之閱讀從而加以選擇的工作。遇到「不合格」的作品，就把它往紙字簍一丟了事。但是懶雲(賴和)當時的文學界的情況卻不是這樣。為了補白報紙空下來的版面，就無法去選擇原稿。他當時幾乎是拚著老命去做這份工作的。他毫不珍惜體力地去一一刪修寄來的稿子，有時甚至要為人改寫原稿的大半部份。常常有些文章，他簡直是只留下別人的情節而從頭改寫。

從楊守愚的見證可以看出推動台灣新文學運動，並非容易之事，但為了「文化向上」，賴和身體力行，並提攜了大量之人才，豐富了台灣文壇。一九三四年

五月在張深切、賴明弘……等人的倡議之下，台灣文藝聯盟成立，這是第一次全島性的文藝大會。會中公推賴和為委員長，但他謙虛推辭，才改推張深切為委員長，賴和則擔任五位常務委員之一。因身處異族殖民統治之下，台灣文藝聯盟標榜的文藝運動，骨子裡是帶有政治性的。這也與台灣文化協會，逐漸由文化運動，邁入社會運動、政治運動有所關聯，隨著左翼思潮的衝擊，二、三〇年代台灣社會是風起雲湧的年代。賴和漢詩中的「破除階級思平等，掙脫強權始自由」、「壓迫自然生反動，艱難豈為慕虛然」、「世間未許權存在，勇士當為義鬥爭」……等等平日的吟詠，在他的新文學作品中，為弱者代言的主調，越來越強。整個台灣社會各階層，也逐漸由與日本異族殖民統治的對抗中，原本具有憧憬性的祖國意識，逐漸分化出以台灣意識為主的風潮，這種民族意識雙重化的構造，在賴和的〈讀台灣通史十首〉之一，對於台灣民主國的曇花一現，以及台灣獨立在原稿與修正稿中，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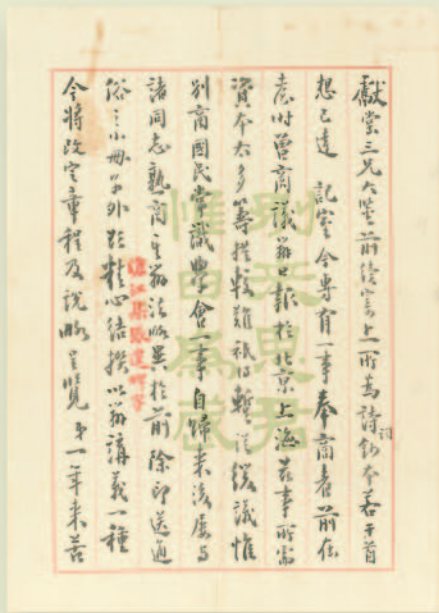
原稿詩云：

其中黃虎尚如生，
國建共和竟不成。
天限台灣難獨立，
古今歷歷證分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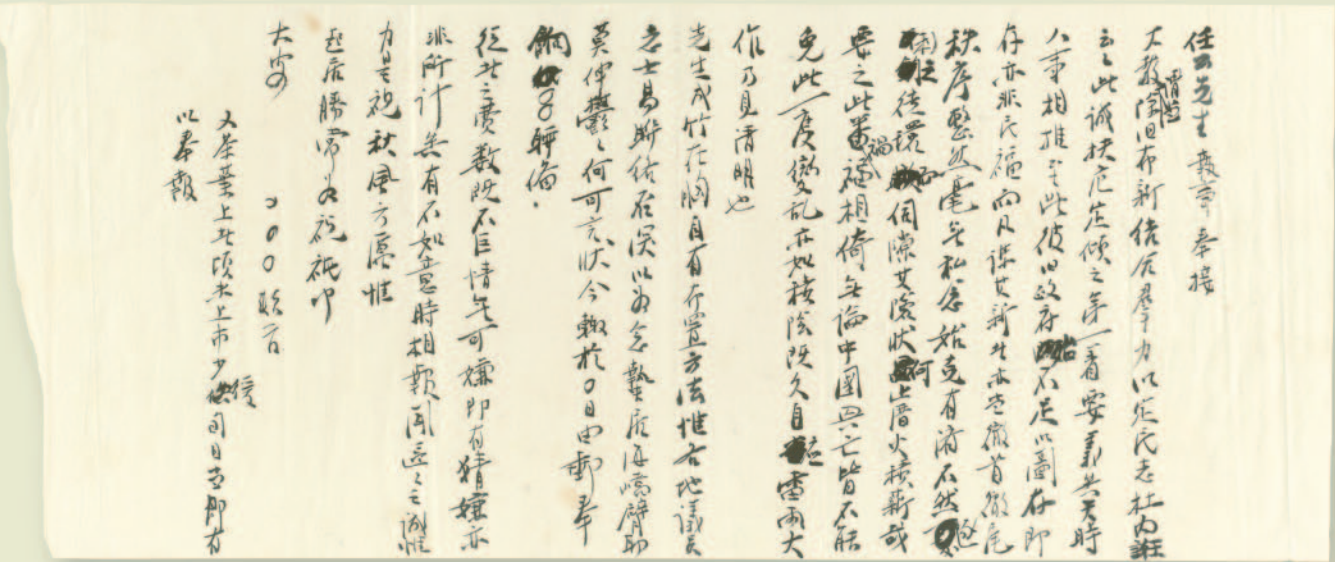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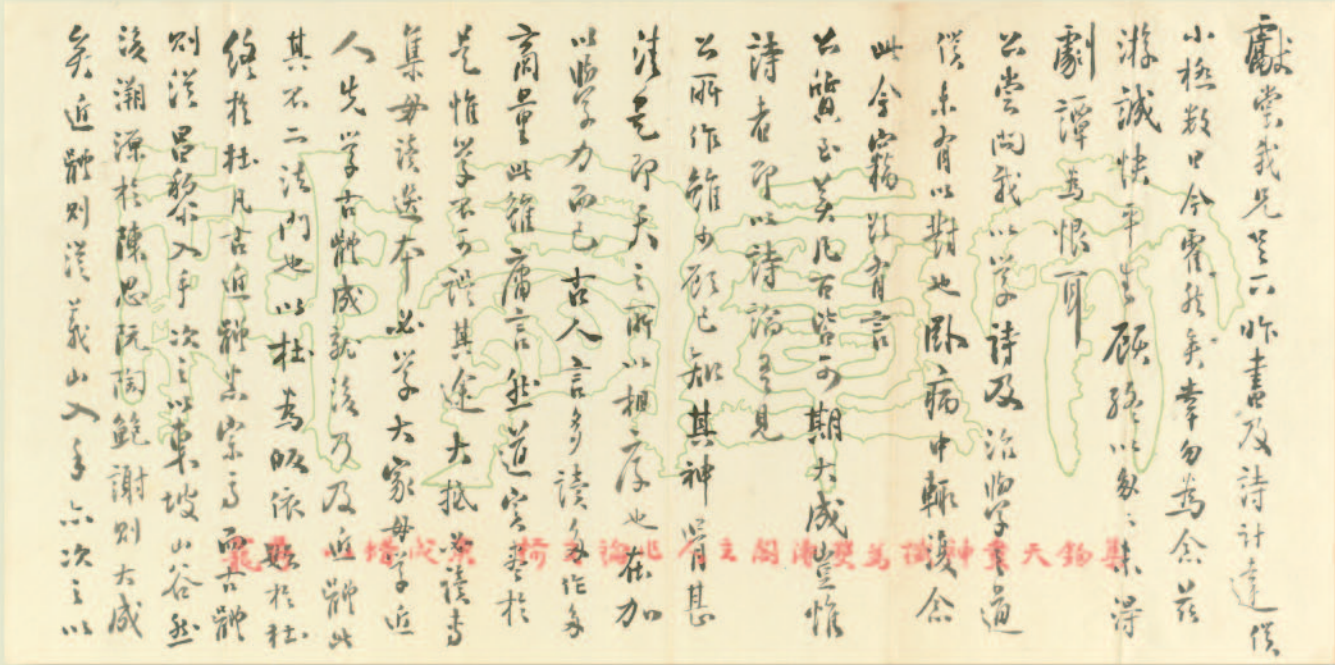
後來修正詩云：

其中黃虎尚如生，
國建共和怎不成，
天與台灣原獨立，
我疑記載欠分明。

雖然僅僅修正了八個字，但對台灣民主國充滿了惋惜，甚至對台灣歷史，有了更深刻的看法。這種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，也反應在三〇年代台灣話文運動，語言為文化的根本，賴和從原先以中國白話文為基調的書寫策略，逐漸放棄原本具有的優勢，而嘗試以台灣話文書寫。當文壇有郭秋生、黃石輝……等作家，以台灣話語文創作，實際上代表著受左翼運動影響的



林獻堂與梁啟超之間交往密切，往來書札十分頻繁。兩人時常為國家及民族大事交換意見，俱記載於此系列信件中。論者多以為，林梁之間的對話，對日後林獻堂在政治路線的選擇上，有著重大的影響。圖為1911年間，兩人間之往來書信手稿，計有四十餘封，現存於國家台灣文學館，為黃得時先生所贈。



作家以台灣大眾為對象並爭取大眾的共感同鳴。探究其深層意義，絕不僅是語言的選用而已，而是確立了以土地與人民為中心的台灣文學主體性論述。

文學與社會脫離不了關係，啟蒙時代的文學創作為時代留下了「真正的印象」(true impression)，並且大多數作家文化抵抗的意圖明顯，透過寫作，給予相當強烈的文學控訴，充分反映了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之聲，這是寶貴的文學遺產。即使三○年代日文書寫世代逐漸興起，四○年代在大勢所趨之下，刊行的主要是日文作品，但除了極少數的作品帶有「皇民文學」的色彩，其主調仍是傳承二○年代以來的台灣文學精神。

三、蔡培火

文學是社會的明鏡，民族心靈的表現，文字則是重要的媒介。台灣向來使用漢字，日本殖民統治逐漸被迫用日文為書寫工具。傳統台灣讀書人閱讀書寫古典漢文，福佬、客家人皆能得心應手。但在台灣文化協會推動的啟蒙運動中，為了普及教育，白話文成為主要的表現方式，以母語書寫則有問題，因漢字並不能充分表達台灣語言。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初期以中國白話文為基調，有其時代的因素。雖然基督教長老會透過《教會報》遠在新文學運動之前三十多年前——十九世紀的八○年代——即有一些以教會羅馬字書寫的報導文學，二○年代亦有小說作品出現，但畢竟侷限於教會圈中，尚未進入廣大的社會。

蔡培火是台灣文化協會理事，早在公學校就學時，由曾受台南讀書的兄長教導教會羅馬字。一九一四年板垣退助來台成立「台灣同化會」之際，他憑著自身學習白話字的經驗，認為白話字便於學習，可以作為台日溝通的方法之一，而不必然使用國語。福佬話是多數大眾的語言，利用大眾的語言，以簡易好學的方式書寫，可以減少文盲，人人可以自行接受新知識，容易達到教育的功能。蔡培火進步的地方，在於不執著於漢字的表達方式，堅持語言在「音」的重要性，認識到表音的白話字亦是字，是表達的媒介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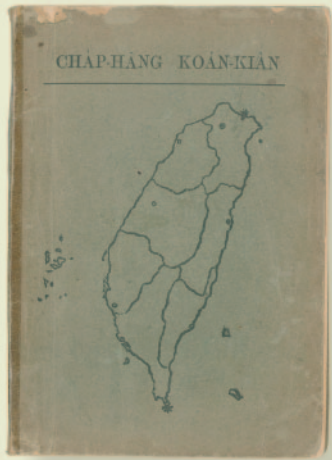
蔡培火反對當時日本的國語政策欲對台灣人進行「同化於民族」的主張，一九二一年十月發表於《台灣青年》三卷三號的〈關於台灣教育的根本主張〉(〈台灣教育に關する根本主張〉)中，提出應放棄國語本位的教育方針，認為應開展台灣話的學習，蔡培火強調：

真正為國家為台灣著想的人，其本領不就是讓已經定型的台灣思想界活潑起來，讓已經形式化的本島教化精神振興起來嗎？……我多年來深思熟慮的結果，相信普及羅馬字是啟發本島精神，建設穩固的文明之獨一無二又經濟有效的手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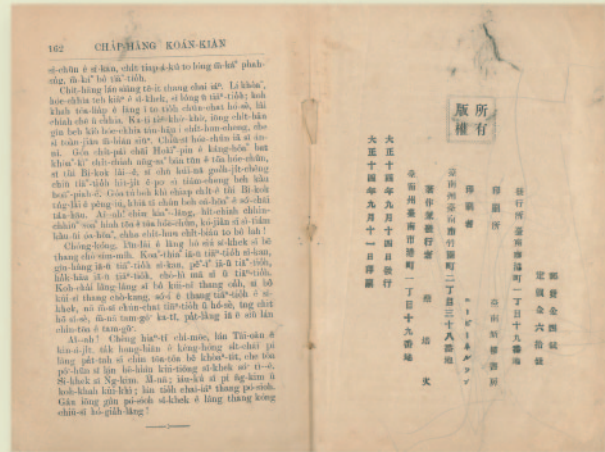
這是從「教化國民」的文明位階來推動羅馬字。蔡培火除了發表一連串關於羅馬字的論述之外，亦身體力行，一九二四年十月以羅馬字出版台灣白話文《十項管見》散文集。一九二四年台灣文化協會第四屆常年大會，蔡培火終於可以由群體的力量，來推動其志業，在新設事業裡增加：普及羅馬字，並且鼓勵文協同人使用羅馬字作為書信的往來。配合白話字研習會的開設，他全力投入。一九二九年一月蔡培火〈白話字歌〉，他仍憂心而吟：

世界風氣日日開
無分南北及東西
因何這個台灣島
舊相到今尚原在
怪怪怪
因何會按呢
怪怪怪
咱著想看覓

「舊相到今尚原在」，可見要推動新觀念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為了普及台灣白話字運動，一九二九年四月蔡培火擬定〈推廣台灣白話字之主旨暨其計畫〉，他的構想是，只要有四十萬元的資本，便能派人到不同的街庄教授白話字；開設編輯書局，請專家編著書冊，各種學科，以最平易的說明法撰寫；建一所印刷廠，印刷書籍，按照成本賣給農工婦女兄弟們。另外還設



白話字的推廣是文協在社會教育上的重要主張。圖為白話文運動健將蔡培火的論說作品《十項管見》，內容描述如何建立現代的社會，全文以白話文寫成。



標社是台灣中部的傳統詩社，成立於1902年左右，以霧峰林家為運作核心。1921文協年成立後，標社中的林獻堂、林幼春、蔡惠如等，都成為主協最重要的幹部，其他人也多與文協有往來。《標社第一集》則為標社為紀念創設廿週年所輯成的詩集。本書現存於國家台灣文學館，為陳雲程先生所贈。

立「傳授部」、「編撰部」、「販賣部」，強調以人道主義為出發點，向有志者募捐，不以營利為目的……等等想法。推廣台灣白話字，雖然在廣大社會終究成效有限，但台灣文學需以台灣語言，才能充分表現鄉土的特色。三〇年代台灣話文論戰，大多數作家仍然執著於漢字表現，各有個人的方式去借字借音都在所不惜，但台灣話文創作大量出現，使得台灣新文學運動，邁入新的階段。台灣白話字在基督教長老會系統中，亦出現更多的文學作品。蔡培火不僅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大力推行台灣白話字，戰後國府時代，亦一貫的強調主張，可說是他一生重要的文化志業。

由上述蔣渭水、賴和、蔡培火等三位台灣文化協會的核心幹部之作為，大體可以了解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台灣「文化向上」的犖犖大端。啟蒙運動當然給台灣社會帶來一定程度的革新，影響所及改變了台灣的體質，也相當程度形塑了台灣人民，弱小民族必須尋找自己的出路。

蔣渭水身為「文化頭」，他起了重大的作用，然而也因太熱衷於政治運動，一九二七年歷經「左右傾辯」之後，台灣文化協會分裂。七月十日台灣民眾黨正式成立，在蔣渭水帶領下，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九日更成立了台灣工友總聯盟。政治運動當然重要，登高聲呼喊「同胞須團結，團結真有力」的動人口號，其實也正反映出不同政團的彼此傾軋。如果沒有堅實的文化形塑國民性，亦不容易達成總體目標。當然，蔣渭水的努力，仍值得我們的景仰與反思。

賴和在啟蒙運動中，堅守文學的本位，他也關心現實的政治，但仍以帶領新文學運動為主戰場。反封建、反帝國、反殖民是台灣文學具體表現出來的精神。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，批評舊社會的陰暗面，不遺餘力地譴責統治者不義，可謂以文學具體實踐「文化向上」了。

蔡培火力推台灣白話字，力圖讓教會羅馬字從教會圈走入廣大的社會，這是改變漢字書寫系統的進步思想。與一九三二年郭秋生台灣話文運動所訴求的「建設台灣話文的確是台灣人凡有解放的先行條件」，雖

站在不同的書寫系統的立場，但無疑都朝向「我手寫我口」的方向努力，但這不僅是語言／文字的操作問題而已！

台灣文化協會的前輩們從八十五年前以來努力過的「文化向上」，當然值得我們重視。即使到今天，做為後輩的我們，仍深受其惠。不過，進一步反思現今社會狀況，封建舊社會的魅影仍如影隨形，某些根深蒂固的迷信只不過隨著現代化，以現代化重新包裝彩飾而已，如賴和及同時代作家所反對的鋪張浪費的迎神賽會，於今尤甚；風水、迷信、卜卦、算命……等等，有權有勢的政客更是在社會上起了帶頭作用。沒有堅實的人文深度，只好託身於鬼神以保權位，資本家為生財亦不惶多讓；流風所及上行下效，滲透社會各階層。「舊相到今尚原在」的現象，都必須深刻反省。文化向上猶須吾人努力！

今天台語／母語的書寫方興未艾，台灣白話字的研習推廣也如火如荼，這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民族文化大工程。更需要政府與民間基金會的大力支持，以展開文學的新紀元。期待有朝一日，台灣的但丁（Dante Alighieri，1265-1321）、普希金（A.S.Pushkin，1799-1837）能紛紛出現，實現台灣文學前輩未完成的夢想。

文化不應僅是政府、社會的裝飾品而已，而是民族的骨髓，關係著民族長遠的生命。在全球化口號高聲鳴響的今天，台灣要在世界上保有自己的特色與位置，透過文化形塑國民性依然是不二法門。

文化向上再向上！



▲台灣文化協會舊址（台北）



▲台灣文化協會舊址（台中）